



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繁荣,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生的重大变革。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主张研究全体民众的历史,被视为社会史研究的发端,引起学界对民间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关注,打破了传统中国史学独重“帝王将相”的局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特殊时期,社会史研究遭到中断,改革开放后迎来复兴,有力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变革与创新,也增进了公众对历史学的认知与理解,至今已蔚为大观。在这一曲折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冯尔康先生被海内外学界公认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引领者,为这一史学领域的复兴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冯尔康先生1934年生于江苏仪征,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年毕业后任助教,师从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攻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冯先生求学期间涉猎广泛,除在郑老指导下钻研明清史,也修习雷海宗、杨生茂等老一辈史学名家的课程,逐渐意识到饮食、服饰等生活方式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萌发了对社会史研究的兴趣。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清代中叶江南租佃关系研究》,探讨了生产关系、地租形态等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议题,也涉及下层民众的产业经营与社会生活,为日后正式转向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史学研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走向活化与深入,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也迅速展开,新的学术思潮正在酝酿。冯先生有感于历史学因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导致的牵强僵硬、趋附时势,又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关注普通民众的影响,立志从事社会史研究。1985年,冯先生在南开大学开设“中国社会史”选修课。1986年10月,在先生发起下,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合作,举办了“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被学界同仁认为“开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之先声”。冯先生在此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开展社会史研究》,发表于1987年《历史研究》第1期,对中国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与意义作出系统论说,强调社会生活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历史得以丰满和形象化。他还敏锐地判断,社会史目前虽属“边缘学科”,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出现繁荣局面”。此文是新时期学界对社会史理论首次自觉作出的探讨,引发广泛影响。冯先生在社会史复兴时期的倡导、引领之功,于斯可见。

冯先生不仅提倡进行社会史研究,更身体力行,率先作出一系列实践和探索,成就斐然。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30余年间,他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宗族史。冯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展开对清代宗族祠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持续推进,撰有《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18世纪以来中国宗族的现代转向》等著作与30余篇论文。他对清代宗族的考察,既重视运用嘉庆朝刑科题本等

新出史料,关注宗族社会的细部状况,包括宗亲互助、财产管理、族人的宗族意识等;也对如何在整体上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宗族提出新见,即宗族自治、互助的功能有助于维系民众生存与社会稳定,宗族内部洋溢的亲情意识也有助于建设当代社会文明,应予以正面评价。不宜因循将族权视为封建主义“四权”之一的旧有思路,对其完全否定。

第二,社会生活史。冯先生长期将社会生活视为社会史的主要内容与研究重点,并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与清初剃发易服为例,强调生活方式的冲突足以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90年,冯先生与常建华教授合撰《清人社会生活》,围绕等级、社团、宗族、家庭、娱乐、婚丧嫁娶、少数民族等议题,对清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出翔实论说,成为国内断代社会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先生在清代社会史领域也撰写了多篇论文,或收入文集《顾真斋文丛》,或以通俗形式改写为《清人生活漫话》一书。又撰《古人社会生活琐谈》

## “写大众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书”

——冯尔康先生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朱亦灵



一书,汇集了他研习和讲授中国社会史的一些成果和心得。先生自陈研治社会史的初衷是“写大众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书”,他对社会生活史的探索与这一旨趣最为接近。

第三,社会结构史。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史的“骨架”,也同样受到冯先生的重视。先生1994年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以各类社会组织与群体为线索,系统考察了先秦至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2019年又有《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这一著作问世。他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考察,认为等级制贯穿一切生活领域,等级意识系统强烈,流传久远,社会结构与生活也受到宗法观念的渗透,反映出古人的从属关系。冯先生《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这一篇名作,也是将等级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农民群体的界定,将没有政治社会特权的平民地主也视为农民,而非笼统地称为统治阶级。

第四,社会史史料学。冯先生鉴于社会史不受传统史学重视,史料较为分散,从而提倡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系统发掘和利用相关史料。例如,他很早就意识到清代刑科题本对研

##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究清代社会风貌的重要价值,自1983年起连续4年带领研究生和本科生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并摘录“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的嘉庆朝档案32351件,共抄出500余万字,从而开创性地利用刑科题本,在一系列研究中细致描摹了18—19世纪中国宗族与下层民众的生活实态。先生及其研究团队抄出的史料,已由南开大学社家骥教授、常建华教授先后以《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2008)、《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2019)为题整理出版,贡献给了学界。昔日不分寒暑的辛勤抄录,至今已结出硕果。

在研究工作之外,冯先生还在其他方面积极推动社会史学科的成长。在他的组织下,中国社会史学会于1987年成立,挂靠于南开大学。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注重研究机构与报刊出版机构合作,共同追踪、引领各类新议题,至今已召开十八届。1986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室,1999年组建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冯先生出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次年,中心获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已成为国内社会史研究的重镇。先生编著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国社会史概论》等研究综述与教材,也对有志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年轻学子颇有助益。

冯先生不仅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引领者,也是一代清史名家。他虽以清代社会史为主攻方向,但在清史其他传统研究领域亦卓有建树。先生1985年所著《雍正传》,有别于将雍正帝塑造为嗜杀暴君的旧观念,充分肯定了雍正在位期间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贡献。此书观点新颖,内容充实,考订精密,影响力超出学界,引起公众的关注。199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雍正王朝》,一时红遍大江南北,剧中雍正帝作为改革家的形象为人熟知。导演胡玫自称《雍正传》是电视剧编、导、演的重要佐证,从不离手:“看了《雍正传》,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先生亦著有《清史史料学》《雍正继位之谜》等清史与满学著作11部、论文80余篇。

2002年,冯先生自南开大学退休,然老骥伏枥,仍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近十年来,先生选取海外华人史、清代天主教与徽州宗族为研究重点,著述不辍。这些选题既是往年研习清史、宗族史的延伸,也源于先生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思考,他对海外华人历史的关注即与常年旅居海外华人社区的观察有关。先生春秋已高,却仍紧追前沿,积极探讨电子数据库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并提倡关注现代第三产业大发展形势下人的活动史,如消费、健身、极限运动等。于此尤能感到,社会史研究萦绕着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怀,也蕴有对大众生活的亲切理解。冯先生表示:“我理解现代史学功能,就是为社会服务为主……为大众读者服务,提供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有益的历史知识,启示人们自觉地从历史事实中汲取智慧,提升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接受他人失败教训,避免误入人生岔路,让生活情趣高尚、生活美满,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好一些、更长久一些。”这番话正如他一贯的行文风格:平易精确、娓娓道来,绝不凭空高论,亦不作佶屈聱牙之语。学术常青,非止我辈后学的美好祝愿,更是对先生以九秩之龄研学不懈的诠释。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 【学人小传】

冯尔康,1934年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毕业,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副会长。从事中国古史史学及清史、中国社会史、宗族史、徽学、清前期天主教史、史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雍正传》《曹雪芹与《红楼梦》》《清史史料学》《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顾真斋文丛》《中国社会史概论》《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18世纪以来中国宗族的现代转向》《中国社会史研究》《清代人物三十题》《崇新集——康熙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冯尔康文集》(10卷);散文集有《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砥砺前行:寻找品格的磨刀石》;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中国宗族史》《清代宗族史料选辑》等。



### 天津解放初期的作家群

天津解放前的文坛较为知名的作家,是写武侠小说的官白羽和写言情小说的刘云若。天津解放后,天津作家群开始形成,他们是进城参与创办《天津日报》的郭小川、方纪、孙犁;随市工会工作组进津的王林;随军管会文艺创作组进城的鲁黎、芦甸,另外还有四名“小兵”,够不上作家但是很有朝气,他们是杨润身、王昌定、鲍昌,这三位都是随文工团进津的,另有一个就是我周骥良,是从地下战线转上来的。

这四名“小兵”对天津文艺创作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杨润身作为编剧之一,参与到电影《白毛女》的创作中,1951年电影上映,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在全国引起轰动的影片。王昌定是个大学生,进津之后他写出了一部《海河春流》,这是天津第一部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鲍昌在天津工作、生活了36年,成为著名作家、评论家、学者、文学组织工作者,后来调到北京工作。从地下转到地上的我,担任新中国第一份文艺小报《星报》的副主编,随后又参加了电影放映审查工作,还写出了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工作》的长篇小说。

这就是天津解放初期的作家群,大家一起推动了天津文艺的繁荣发展。

### 天津名票友王君直

王君直(1867—1931),盐商世家子弟,早年在清王朝末年的学部做过事,后来又当过天津商会副会长,称得上是有头有脸的文化人。他一生热爱京剧,组建了一家京剧票房,和票友们一起学唱、研究

## 忆旧二则

周骥良

谭鑫培的谭派戏。有一年他去北京办事,在一饭庄赴宴,那时饭庄雅座之间都是隔着一个门板,不见人但是能够听见声音,他即席唱了几段谭派戏。孰料,门板那边的恰恰就是谭鑫培,惊得谭鑫培过来问侯并说,你唱我的戏就像我唱的一样,你是怎么学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于是两人成了一位如故的好朋友,谭鑫培后来只要到天津演出,就找王君直坐在场面的后边,这样可以听得清楚,也看得清楚,他成了研究谭派戏的专家。

当年孟小冬随着她的师傅月九来到天津,因为孟家班光跑外地没进过北京天津,所以在京剧界人看来这是外户人家,不成正统,月九就把孟小冬带到天津,让她接受正规洗礼。孟小冬当时唱的是孙菊仙的孙派戏,讲究的是高门大嗓,月九就托人请王君直来看戏。王君直来了,看了一场戏,就叫人把月九和孟小冬叫来,他说:这戏是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女孩子家扯着嗓子喊,这不是唱戏啊,这是喊戏呀,不行!并说她气力不足,还是学余派戏吧!余派戏讲究的是韵味,讲究的是低音高唱。于是,孟小冬从此改唱余派戏。

孟小冬的余派戏是谁教的呢?她到王君直的京剧票房,那儿的都对余派戏有所研究,所以孟小冬在天津找到艺术的起点,开始脱胎换骨。她在天津唱得很红,到北京唱得更红了。

后来王君直去世了,孟小冬一直记着王君直对她的嘱咐,就托人向余叔岩传话:我是受王君直指点才学余派戏的,你的徒弟不多,而且有的不能传你风格一致的唱法(这确实是余叔岩的要求,他要求台上台下都必须风格一致,你演一种类型就不能演另外一种类型),可否收我为徒。余叔岩当时已身患绝症,但是感念恩师王君直(二人有师生之谊)的培植,就收了孟小冬做徒弟,孟小冬拜师学艺,传承了余叔岩的艺术。

## 百岁忆往

鲁迅家吃过的零食,除了从街上店铺中买来现成的外,自己家也做。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关于鲁迅家自做的风干荸荠,有这样精彩的描写:“墙上拉着一根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接着还形象地写了许广平甜她吃风干荸荠的话:“吃吧,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风干荸荠确实是江南一带的特产,做法简单,只需削去紫皮,在阳光下晾晒就行。也有不削皮的,洗干净,连皮吃,也别有风味。荸荠干不但甜,还有开胃、清热化痰等功能。鲁迅家和江南普通人家一样,逢时令也会晒一些荸荠——这多半是鲁迅的提议,因为看到小贩售卖荸荠,自然就会泛起儿时的记忆,嘱咐广平来晒,算作零食点心的补充。

周作人写过一篇《甘蔗荸荠》的短文,开头便说:“若是问绍兴有什么好水果,其实说不上来,不过那水果多而且质朴,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的,与北京相比,这很容易明白。北京水果除杏子桃子柿子外,梨与苹果,香蕉柑橘,差不多都是贵重品,如要买一蒲包送人,往往所费不貲。”接下来,以为他要文归正传,谈绍兴的甘蔗和荸荠了,可直到文章读完,关于这两样水果,还是这四个字,“甘蔗荸荠”。鲁迅写他小时候吃蔬果的记忆,倒是直白和老实,其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鲁迅“反顾”的这些蔬果中,没有荸荠。鲁迅这篇小引写于1927年5月1日,人在广州,可能并没有吃到荸荠,也可能是荸荠的记忆没有前述蔬果深刻。

鲁迅在小说里两次写到了荸荠,一是在《祝福》里,小说写到消失后的祥林嫂在过了两个新年之后,突然出现了,“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有先前那样精神了。”那个“荸荠式的圆篮”,就是祥林嫂随身带着的,可以盛些零碎东西。而这个比喻也好,圆篮

的形状立时就定格在读者心中了。另一次是在《高老夫子》里,在描写高老夫子预备课程时,鲁迅写他“烦躁踱步”的心理活动,有这样的描写:“从繁杂的心绪中,又涌出许多断片的思想来: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角的瘢痕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但同时还模模糊糊听得谣曲说着话:‘……赐了一个荸荠……’”为什么要赐了一个荸荠呢?高老夫子思想已经零乱了,可能想起了虎杖荸荠的吧?而谣曲的滑稽味道:“醉倚青鸾上碧霄,……超超脱脱……那邪孽孽叩求了五回,这才赐了一首五绝……‘红袖拂天河,莫道……’蕊珠仙子校……”这哪里突然出现的“么”赐了一个荸荠,可能是高老夫子想起童年的某些细节,也可能是荸荠有着吉祥之意,让自己的课好起来。总之是高老夫子的一种幻想。再说周作人所写的《甘蔗荸荠》一文发表后,自觉属于“标题党”,认为是“犯规矩的”,便又重写了一篇《关于荸荠》来弥补遗憾,在这篇短文中,周作人说:“荸荠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讲,倒也算了,英国叫水栗子,日本叫做黑慈姑,虽有意义,却很有气,可以想见是不懂得吃这些东西的。荸荠自然最好是生吃,嫩的皮色黑中带红,漆器中有一种名叫荸荠红的颜色,正比得恰好。这种荸荠吃起来顶好,说它怎么甜并不见得,但自有特殊的质朴新鲜的味道的,与浓厚的珍果正是别一路的。乡下有时也煮了吃,与竹叶与甘蔗的乡同煮,给小孩吃了说可以清火,那汤甜好吃,荸荠熟了只是容易剥皮,吃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滋味了。用荸荠做菜做点心,凡是煮过了的,大都没有什么好吃,虽然切了片像藕片似的用糖醋渍了吃,还是没味。”周作人写到这里,还记得一种更小的荸荠:“此外有一种海荸荠,大概是海边植物的种子,形如小慈姑,大如花生仁,街上叫卖,一文钱一把,吃起来甜中带酸,小孩们很是喜欢。甲午前后,杭州有过一家稻香村似的店,名曰野荸荠,不知何所取义,难道说是说的海荸荠么?”其实乡间小河浅滩上或洼地里,确实有这种野荸荠。至此,周作人没有说到像鲁迅家窗外铁丝上挂在篮子里风干的荸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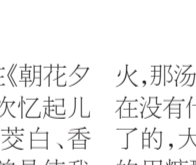
不过,在《湿套钱》一文中,对于荸荠不能做蜜饯,周作人拿它和甘蔗做了对比,表示遗憾之余,对能切片糖渍略感欣慰:“甘蔗真是果中英皇,除生吃外可榨汁煎汤,制成宝贵的糖,却不能做蜜饯制罐头,荸荠还可切片糖渍,比起来还不如了。”行文至此,又唤起笔者对鲁迅家窗外铁丝上那些小提盒、铁丝笼的想象,很馋那里面晒着的风干荸荠啊。

生活中的鲁迅(十六)

## 风干荸荠

陈武

洁上丛话



## 一次奇遇

李超元

我有幸经历了一次走进彩虹里面。那是1962年初秋,我当兵第二年,在吉林省公路河的大山里施工。连队的营房建在一座山的半山腰,周围是高大密集的树林。离营房大约几十米远的山坡上有一眼泉,泉水清澈,一年四季水流不断。即使到了冰雪封山的寒冬,泉眼四周的水花结成了一圈半尺多厚厚的冰墙,泉水照样潺潺流出,冒着淡淡的白色雾气,在冰墙上融化出一道缝隙,静静地流往山下。一次,我竟发现在那圈冰墙上长出了十几朵黄花!我惊呆了:怎么寒冬里在冰上还能长出这样美丽而又柔弱的小花来?我小心地掐下一枝,花枝有小拇指那么长,像豆芽菜梗子一样细的花梗上,顶着几片纽扣般大小、嫩黄色的圆形花瓣,没有一片叶子,却长得很有水灵,太神奇了!后来请教一个东北兵,他说那叫冰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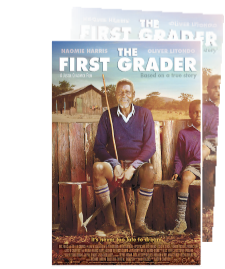
我们连队吃水和洗脸刷牙洗衣服用水,全靠这眼泉。一天下午大约三四点钟,我端着洗脸盆去泉眼那洗衣服,快走到时,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视线前方竟矗立着一弯巨大的彩虹,那真是一道赤橙黄绿青蓝紫的

彩条排列起来的巨型彩虹,而且是双彩虹。彩虹的一端远远地伸向山外的平原,另一端就落在眼前的泉眼上,离我只有十几步远。我急忙向彩虹奔去。彩虹就在眼前,看得真切真切,似乎伸手就可以摸着。我脑子里不由浮现出那些古老传说的画面:彩虹是一座通天的桥,沿着它走上天就可以走到天上;彩虹里有许多铜钱,谁要是能够摸着,手一搂就能搂到一把钱;谁要是摸到彩虹,一生就会有好运……

我跨进彩虹里面,四面观望,奇怪,什么颜色也看不见了,伸手摸一下,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根本不像传说的那样。我退后一步,退到彩虹外面,依然看到彩虹就在眼前。我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进进出出,和彩虹“玩耍”着。也许彩虹这条“龙”喝足了水要走了,“龙头”渐渐离开泉眼抬高了。这时,炊事班副班长挑着两个铁水桶,哼着四川小调悠悠地来打水。他一抬眼也发现了彩虹,赶忙往泉眼处跑来,铁水桶发出了零当啷的响声。可惜,等他跑到泉眼跟前时,彩虹已经升高,伸手够不着了。副班长急忙举起扁担向空中抡去,想钩到彩虹,但扁担钩子甩了半天也没有用,彩虹仿佛加快了升高的速度,已经高高升到半空中,而且色彩渐渐淡化,逐渐消失。气喘吁吁的副班长这才失望地把扁担扔到地上,眼巴巴地望着天上。世界上有些华丽的事只宜远看,不可深人,近观则如我这一次邂逅彩虹的奇遇。

## 满庭芳

第五三〇一期



## 《一年级生》: 笔中自有力量

何映晖

“我在非洲有一个农场,就在恩岗山下。”这是一个发生在肯尼亚的故事,有着诗一样的风景、流畅的音乐和淡淡的怀旧之情。故事讲述了一位84岁的老人,想要入读小学一年级,这就是2011年上映的传记影片《一年级生》。影片人物原型叫马鲁格,2004年,他以84岁的高龄就读小学一年级,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世界最老的小学生。马鲁格是肯尼亚的一个农民,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上学,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茅茅运动”,被英国殖民当局囚禁8年,身上留下伤疤。在2004年之前,马鲁格

已经有15个孩子,30个孙子孙女,还有了曾孙辈。2004年1月,他决定去上小学,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肯尼亚政府2003年推出的一项政策:为所有国民提供免费小学教育。马鲁格进入小学,和一群6岁左右的小学生一起学习。当时,他的两个孙子也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去上学时,马鲁格坦率地说,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好算术,学会数钱,“我不希望因为我是文盲而被年轻人骗走补偿金。”马鲁格每天拖着一条瘸腿步行4公里去上学,对知识的渴望促使他咬牙坚持下来。英国导演贾斯汀·查德维克偶然看到根据马鲁格人生经历写出

的剧本后被深深吸引。他前往肯尼亚拜会马鲁格,花了数周时间和对方交谈。查德维克说马鲁格有一种“无法阻止、无法打破的精神”,深受感动的他立即着手筹拍这部电影,遗憾的是,就在影片开拍前,马鲁格去世了。2009年8月14日,马鲁格因身患胃癌在内罗毕病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充满斗志,即使罹患重疾,也仍然要求读书上课。

《一年级生》还是一部探究教育平等的电影。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近五百年前,德国的马丁·路德第一次提出“义务教育”的概念;进入21世纪,时年84岁的马鲁格因为肯尼亚的免费小学教育政策而有了读书的机会。影片中,因为想要读懂一封信,马鲁格排除万难也要留在课堂,而当信件内容最终揭晓,埋藏在背后的故事一定会感染所有的观众。一起走进佳片《一年级生》,看一位“80后”老人如何体验课堂上的快乐时光,如何向世界展示笔中自有力量。

11月9日22:22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一年级生》,11月10日14:5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